

The End of The Euro

The uneasy future of the
European Union

欧元的终结?!

欧盟不确定的未来

(美) 约翰·冯·奥弗特韦尔德 / 著
贾拥民 / 译



非外借

英国脱欧

特朗普赢得大选

法德“轴心列车”引领的欧盟将驶向何方?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欧元的终结?!

欧盟不确定的未来

(美) 约翰·冯·奥弗特韦尔德 / 著
贾拥民 /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欧元的终结?!: 欧盟不确定的未来 / (美) 约翰·冯·奥弗特韦尔德 (Johan Van Overtveldt) 著; 贾拥民译. —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7. 1
(西方经济·金融前沿译丛)

书名原文: The End of The Euro: The uneasy future of The European Union

ISBN 978-7-5080-9094-8

I. ①欧… II. ①约… ②贾… III. ①欧元—研究 IV. ①F8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06148 号

Johan Van Overtveldt: *The End of The Euro: The uneasy future of The European Union*

Copyright © 2011 Johan Van Overtveldt.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B2 Books, an imprint of Agate Publishing, Inc.

Through the Chinese Connection Agency, a division of The Yao Enterprises, LL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2 by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本书英文版由 Agate Publishing, Inc. 于 2011 年出版。

本书中文简体版权由 Agate Publishing, Inc. 授予华夏出版社, 版权为华夏出版社所有, 未经出版者书面允许,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内容。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2-1054 号

欧元的终结?! —— 欧盟不确定的未来

作者 [美] 约翰·冯·奥弗特韦尔德

译者 贾拥民

责任编辑 李雪飞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7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1030 1/16 开

印 张 15

字 数 202 千字

定 价 46.00 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3331 (转)

网址: www.hxph.com.cn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序

约翰·冯·奥弗特韦尔德撰写的这本书是专门讨论欧元问题的，它的篇幅不长，但是非常及时。此时此刻，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等国正陷于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水深火热之中。在欧盟各国的首都，欧元体制是不是要继续维持下去，也成了一个热门的议题，得到了广泛的讨论。奥弗特韦尔德叙述的内容很全面，为读者带来了非常有冲击力的信息。该书第1章主要关注历史，阐述了推动在欧洲范围内实现货物、服务和人才自由流动的种种努力，及其背后的各种政治力量（尤其是法国的各种政治力量）。第2章侧重于理论分析，考察欧洲的各主要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是否达到了最优货币区的标准。第3章则集中描述了2009年以来震撼整个欧元区的金融危机。作者在最后一章，即第4章中给出了自己的判断：德国将脱离欧元，因为继续坚持下去成本实在太高了。

到目前为止，欧洲联盟仍然尚未完全定型，各项有关活动仍然在继续向前推进。当初，在制定欧盟宪法时，只差一点就把各国都必须采用欧元写进去了。宪法是用来界定各种权利（特权）和义务（承诺）的，同时，它还必须确定修订与各种权利和义务有关的条文的规则和程序。此外，各种宪法规定的行为和判决，一旦成了先例，也将成为宪法的附文，虽然它们的法律地位要低于正式的宪法条文。

美国宪法是在几个星期内制定出来的，那是在1776年的夏天，当时13个殖民地正准备宣布脱离其母国——英国——而独立建国。对于各殖民地的单方面行动，英王乔治三世是不可能接受的，因此，

2 欧元的终结?! ——欧盟不确定的未来

独立战争的爆发也就不可避免了。在此之前，13个殖民地之间曾经订立过一个协约——《邦联条例》。制定一部美国宪法的倡议这个事情本身就足以表明，《邦联条例》无法为即将卷入独立战争的13个殖民地提供一个足够强大的中央权力机构。13个殖民地各派出4—5名代表参与起草宪法，他们代表着当时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400万人。这些人有共同的语言、文化，他们定居于此的历史也都相似。但是，各殖民地之间也存在着商业上的竞争，以农业为主的那些州（殖民地）与以工商业为主的宾夕法尼亚州和纽约州之间存在着商业利益上的冲突。各农业州并不希望建立一个过分强大的中央政府。

与美国制宪过程相比，为新欧洲制定一部新宪法则要困难得多、复杂得多。事实上，欧洲各国已经走过了一个漫长的立宪过程，它们在50多年内订立了无数条约。在所有这些条约中，其中一部分用各方缔结条约时所处的城市来命名，另一部分则用某个人的名字来命名。奥弗特韦尔德用简练的笔触全面地描述了上述历史发展过程。根据最早的条约成立的煤钢共同体只涉及6个国家，现在整个欧洲联盟已经包括了26个国家，涉及的人口超过3亿。这些国家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发展历史也大相径庭，而且许多国家都曾经卷入过领土冲突和其他争端，甚至曾经相互开战。在这个联盟中，大国的人口和经济实力相当于小国的10—20倍。总体来看，构建一个新欧洲的过程显得非常务实，因而也是非常盎格鲁-撒克逊式的。

不过，从根本上看，新欧洲面临的问题与当年聚集在费城的各殖民地的代表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完全相同的，这就是，究竟要赋予“中央政府”多大的权力？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对比法国和德国各自采用的不同铁路系统之间的差别来加以说明。法国的铁路系统是以巴黎为中心向全国辐射的；而在德国，则存在多个区域性的中心，它们包括汉堡、慕尼黑、莱比锡以及柏林，铁路从这些区域性的中心向外辐射。欧洲联盟的各成员国中，法国和其他较小的国家希望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权力机构，而德国和英国则希望看到一个更弱一些的中央权力机构。德国人认识到，如果新欧洲出现一个强大的中央

权力机构，自己的选择就会受到限制，同时源于柏林的流向布鲁塞尔的大规模的转移支付也将不可避免。

新欧洲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自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之间，法国和德国之间曾经爆发过3次大规模的战争，还有许多其他国家卷了进来。不过，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欧洲在总体上一直保持了和平，其间只发生了少数几个例外的事件，它们包括南斯拉夫的解体和塞浦路斯的暴乱，以及因鳕鱼保护和捕鱼争端而引发的英国和冰岛之间的冲突。整个欧洲已经变得非常繁荣。

到了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即欧洲开始沿着两条道路前行：欧洲联盟大多数成员国都加入了一个“内部俱乐部”，它们采用共同的单一货币——欧元；而其他少数成员国则组成了一个“外部俱乐部”，它们不采用欧元。决定不参加“内部俱乐部”的是英国和另外几个较小的国家。这种双俱乐部的“双轨制”是欧洲一体化过程中的实用主义精神的另一个例子。

许多人对欧元能否继续存在下去持怀疑态度，这主要是考虑到希腊问题可能是无法解决的。希腊和葡萄牙之所以会产生庞大的财政赤字，是因为“钱一直都在那里放着”，这两个国家就像“香蕉共和国”的各成员国一样，总是可以借到钱。在申请加入欧洲货币联盟并成为其中的一员时，希腊政府耍了一些手段。有证据表明，希腊政府在有关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的数据上做了假，才勉强符合《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标准而允许加入的。此外，希腊加入欧元区时采用了“错误的汇率兑换办法”，其庞大的财政赤字主要源于其巨额的贸易赤字，而这反过来又恰恰反映其成本和价格早就过高了。许多欧洲大型银行都心甘情愿地卷入这个愚蠢的金融黑洞当中：如果资助希腊、葡萄牙政府的这些钱不存在的话，那么希腊和葡萄牙原本是不可能产生如此巨额的赤字的。希腊和葡萄牙都存在着基本财政赤字，它们用来支付债务利息的钱全都来自新的贷款。

紧接着，当事态发展到了某个阶段后，资助希腊政府的那些银行终于认识到，希腊政府已经无法再承担这么多的债务了，经济也

无法继续运转了，于是，这些银行说，“再也没有新的资金了”。因为基本赤字已经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6%或7%，希腊政府无法筹集到足够的资金向银行贷款人支付利息和政府公务员的薪金。所以，希腊政府不得不违约，并不得不将其支付给政府雇员和国内供应商的款项削减5%至6%。违约很可能意味着希腊也许将不得不离开欧洲联盟的“内部俱乐部”。

再后来，债权人和投资者认识到，包括爱尔兰和西班牙在内的一些其他国家的政府也都存在着基本财政赤字。不过，这些国家的金融形势不同于希腊和葡萄牙。爱尔兰和西班牙都是在房地产泡沫破灭后才出现庞大的财政赤字的，之前，这两个国家都曾是充满活力的出口国。

那么，为了维持金融形势，德国、法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政府可能选择什么样的政策呢？第一个政策是，向希腊、葡萄牙和爱尔兰政府提供政府贷款，使它们能在财政赤字的情况下继续运转下去，直到它们的赤字值下降到某个可忍受的水平上。这个政策意味着，必须针对希腊政府减少其财政赤字的努力设定目标和条件。第二个政策是，促使希腊、葡萄牙和爱尔兰等国政府违约，从而使这些国家的政府债务占其GDP的比重达到50%或60%的水平。第三个政策是，向银行提供财政援助，以便让银行有能力自行解决它们与希腊政府和葡萄牙政府之间的问题。第四个政策是，让希腊脱离欧洲货币联盟，这包括迫使希腊采用另外的某种货币并有效地贬值，但这也意味着希腊政府违约。第五个政策是，德国退出欧洲货币联盟。

各种政策都有被挟持的危险。类似这样的威胁随处可见：如果钱没有着落，就可能发生非常糟糕的事情。欧洲各大银行正在利用希腊和其他负债累累的国家的政府的艰难处境来为自己牟取利益：它们出于拙劣的运营政策而给了这些政府巨额贷款，现在又要求援助这些政府，以保护自己的债权。这些政府威胁着银行体系的偿付能力，这一点恰恰成了这些银行获取更多资金支持的借口。

当然，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如何苦苦熬过这场危机。银行需要调

整其资本结构，或许它们应该根据它们制定的不良资产援助计划去援助这些国家的政府。而其他国家的政府则应该向那些要求政府提供金融支持的银行收取股权利得。必须划定明确的界线，不能把界线画在沙子上，而要把界线画在坚硬的混凝土上。必须向高债务穷国发出非常明确的信息：“所有的钱都在这里了，其总额就只有这么多。这些钱用完后，你就只能靠你自己了。如果你认为你必须离开‘内部俱乐部’，无论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好，那是你自己的选择。你必须搞清楚这一点，我们对你的重要性可比你对我们的重要性要大得多”。

从更长的时期来看，问题在于如何确保这种类型的危机不会再次发生，而且要保证在当前这个阶段所必须采取的援助措施不至于增加将来“搭便车”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后者是一个道德风险问题。有两个因素会使这个问题更趋于复杂化：第一个因素是，每个国家都是主权者，这只是一个幻象，债务国，尤其是弱小债务国，它们的地位从来不曾与大国平等过；第二个因素是，许多人压根儿不愿意考虑有某一个或某几个国家可能会离开“内部俱乐部”的可能性，他们只是想当然地认为这种情况根本不可能发生。

我在上面所叙述的内容与奥弗特韦尔德所预测的结局有所不同——他说德国将主动退出欧洲货币联盟。如果希腊先行一步地脱离“内部俱乐部”，那么欧元将会升值。从理论上讲，将德国主动放弃欧元所带来的一切后果阐述清楚，要比将希腊脱离欧元后的情况描述出来困难得多。无论如何，如果德国主动采取行动，离开欧洲货币联盟，那必定将会成为一个新的标志性的事件，其影响是希腊脱离欧盟所不可比拟的。如果真是那样，那么德国就是在进行“经济自杀”。通常来说，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但是也不能排除真的发生的可能性。因此，最大的可能是，德国将设置一些条件，促使某些小国决定退出，因为继续留在“内部俱乐部”的成本将变得太高。

希腊危机所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一个货币联盟是否同时还需要一个财政联盟，或者说，要支撑一个货币联盟，需要何种程度的

财政联盟。从长远看，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确保各成员国之间支付的不平衡能够实现自我限定。要采取一个共同的货币政策，就要求各成员国之间的通货膨胀率没有显著的差异。但是，制造业部门所占比例更大的国家的生产率高于其他国家，这是一个事实。因此，更好的调整方式应该是，使那些产出更高的国家的工资增长更迅速一些。

欧洲立宪这个伟大的试验要取得成功，面临的问题极其多，需要采取的政策措施也非常多样，奥弗特韦尔德精准地对这些问题和政策措施进行了排序。本书的篇幅并不长，但是价值却非常高。

罗伯特·阿利伯

(本序作者是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的国际经济和金融学荣誉教授、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阿利伯还是经济发展委员会以及货币和信贷委员会的研究人员，同时兼任美国国务院经济发展局的高级经济顾问。)

导 言

欧元正在为了生存而挣扎。十多年来，制定政策的政治家们一直对关于欧洲货币联盟的结构性缺陷的警告不闻不问。到了今天，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都陷入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之中，同时西班牙、意大利和比利时也正沿着同样的路径沉陷下去。在欧洲联盟内部，总体气氛充溢着不确定性和对未来的恐惧。欧元区各成员国必须改变游戏规则，不然联盟就无法继续存在下去。但是，欧洲的政治领导人们一直未能采取果断的行动。

2010年12月上旬，德国财政部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声称，金融市场“不理解欧元”。^①而就在这之前的几天，时任法国财政部部长和现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的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在接受电台记者采访时也说过类似的话，“金融市场很难理解欧洲”。^②

欧元区金融危机于2009年年底爆发时，有关当局予以根本性的否认。它们辩称，这根本算不上是一个危机，这不过是运气不佳所带来的结果，来得快，去得也快。然而，仅仅在几个星期之后，这种说法的可信度就荡然无存了，危机的严重程度使任何类似的辩解都不堪一击。很快，欧洲的官员们就转而采取了另一个新的立场：这场危机是由贪婪的投机者造成的，其根源是存在于金融市场上的种种不负责任的、不理智的行为。以德国官员为始作俑者，许多欧

① 朔伊布勒上述言论转引自2010年12月6日的《金融时报》。

② 拉加德上述言论转引自2010年12月4日的《金融时报》。

洲官员还加上了第三种说法，即希腊和爱尔兰等国家政府的不负责的政策也难辞其咎。

在欧洲各国的领导人口中，最容易成为替罪羊的是“贪婪的投机者”和“不负责任的市场”，在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最初几个月里尤其如此。不过，还是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奥地利财政部部长约瑟夫·普勒尔在2010年春天便宣称，他“反对把全部责任都归咎于投机者。因为只有针对那些多年以来财政状况一直不良的国家进行投机炒作时，才能取得成功”。^①

好几位欧洲政治领导人都言之凿凿地指责对冲基金、富有的私人投机者、评级机构、债券市场管理机构和投资银行（以及其他所有可能成为替罪羊的机构或个人）。这些领导人包括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法国总统尼古拉斯·萨科齐、欧盟主席赫尔曼·范龙佩和欧洲委员会主席何塞·曼努埃尔·巴罗佐。他们众口一词地声称，欧元是健康的，不存在根本性的问题。瑞典财政部部长安德斯·伯格则狠狠地把“盎格鲁-撒克逊式的金融资本主义和金融市场”钉在了十字架上，他把它们比喻为狂热执著的、野蛮无情的、追逐猎物的“凶恶的狼群”，时刻准备一哄而上，把“那些弱小的国家撕成碎片”。^② 卢森堡首相、同时兼任欧元区财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让-克劳德·容克甚至臆想，一场有组织的针对欧元的攻击正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综观全欧洲，各国领导人都坚持认为解决方案其实很简单：政治对于投机性金融活动的优先地位必须重新得到恢复。

总部位于伦敦的欧洲改革中心的首席经济学家西蒙·提尔福德指出，“危机的发生和延续至少部分地归咎于金融市场这种说法，只能用来强化欧洲属于某个特殊的世界的世俗之见。市场只是戳穿了欧盟的虚张声势。事实上，这是市场本来早就应该做的一件事情，

① 普勒尔上述言论转引自2010年5月10日的美联社报道。

② 伯格上述言论转引自2010年5月17日的《金融时报》。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危机或许是可以避免的”。^①《金融时报》评论员沃尔夫冈·明肖则指出，“欧洲各国政治领导人的所作所为并不是在解决问题，他们只是在打公关仗……综观欧洲金融危机的历史，我们早就发现，欧洲的政治家们没有与金融市场沟通的能力，他们只知道从债券持有人那里搞钱，用来资助他们过度庞大的赤字；然后当这些债券持有人萌生退意并推高了利率后，他们却显得出奇的愤怒”。^②

意大利联合信贷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马科·阿农齐亚塔的观点也与提尔福德和明肖类似，他还补充道：

欧元区的决策者们应该潜心思考一下，不要再把市场看做是一个贪婪的投机者的集合体。特别地，在考虑主权债券这个具体标的时，市场大体上是由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等机构投资者组成的，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试图保护其投资的价值。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履行他们对退休人员和其他公民的义务。当这些机构的投资者就主权债券的风险提出意见时，决策者们应该虚心听取，绝对不应该把它们当做敌人。^③

“市场不理解欧洲（欧元）”这种说法表明欧洲官员们的嘴上工夫变得更厉害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当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到了2010年，当一切都变得再明显不过时，一些欧洲官员开始公开承认危机，范龙佩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在2010年年底，范龙佩就宣称，“欧元的基础一直过于薄弱……在只采用单一货币的情况下，我们需要更大范围的政治整合，但是在现实中，我们

① 提尔福德，2010a，第2页。

② 参见2010年5月10日的《金融时报》。

③ 阿农齐亚塔上述言论转引自2010年5月17日的《金融时报》。

所做的却正好相反”。^①从根本上说，欧元和欧洲统一货币联盟面临的问题是结构性的、全局性的。本书的目的就是要从历史的视角来说明这一点。

从一开始，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Europe's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EMU）就是作为一项政治工程而出现的。在20世纪，欧洲大陆两度遭受战争之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了防止类似的灾难再次发生，欧洲各国的政治领袖们和知识分子们开始合作，着力创建一个统一的欧洲。当然，毫无疑问，这是一项极其复杂和困难的任务，尤其是因为冷战期间，美国和前苏联在欧洲开展军备竞赛，冷战铁幕把这个大陆分割成了两半。几十年来，民族主义一直是阻碍欧洲主要国家之间建立直接的政治联盟的拦路虎。然而，在西欧各国之间，就经济和货币问题达成共识似乎是可能的。创建于1957年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就只着重关注建立经济联盟的问题。

乘着1989年两德重新完成统一的春风，法国前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说服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科尔接受建立一个货币联盟的主张。密特朗在政治上的高度敏感性，终于使法国精英们几十年来梦寐以求的谋划开始逐步变成现实：打破德国的货币霸权，同时遏制作为德国中央银行的德意志联邦银行对欧洲货币和经济命运的主导地位的提升。正如英国前首相约翰·梅杰所指出的，“在1992年，我们（英国）与法国的立场差异在于：法国试图把单一货币作为‘打倒利维坦’——约束德意志联邦银行——的一种手段”。^②

当然，在事实上，法国的经济无法与德国相提并论。但是，法国人却依然一厢情愿，他们彻头彻尾地相信：自己应该在欧洲和世界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法国人把欧洲看做是实现自己战略目标的唯一可行的路径。货币和汇率政策是唯一可能在全欧洲达成广泛共识的东西，法国政治家们恰恰抓住了这个机会。

^① 范龙佩上述言论转引自2010年12月24日的《荷兰鹿特丹商业报》。

^② 梅杰上述言论转引自马什，2009，第162页。

到了1999年，11个西欧国家之间终于形成了一个货币联盟。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1991年12月签订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是最重要的第一步。欧元最终成了该联盟的单一货币，而欧洲中央银行（European Central Bank, ECB）则成了其唯一的具有决策职能的中央银行。

经济学家们很早就认识到，从一开始，欧盟各成员国之间就存在着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如果过于严重，就可能威胁到整个联盟的生存。经济学家们指出，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各成员国都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根据经济学中已经相对成熟且完善的最优货币区理论，这些条件包括：存在着政治联盟和财政联盟，存在着流动性和灵活性足够高的劳动力市场。

面对经济学家们的忠告，政治精英们只是给出了口惠而实不至的回应，实际上却坚持认为这些条件都是不必要的。政治精英们声称，只要展现出来的持久性和统一性足够显著，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就能够自动地成为一个强大的、统一的货币联盟；而且，要高效率地运作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就需要各方在政治上实现高度合作，而这个过程就会自然而然地带来政治上的统一。

政治精英们把上述推理作为欧洲统一大业的理论基础，这样一来，在他们的“精心呵护”下，一个伟大的想法也就慢慢地蜕变为了一场巨大的赌博。有一种观点认为，欧洲的政治家们能够解决任何突发性危机，这一可疑的观念竟然成了整个计划的基石。比利时前首相、在全欧洲都能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重量级政治人物让-吕克·德阿纳说：“从一个危机到另一个危机，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统一的欧洲的观念开始形成，并逐渐成为现实。要取得进展，我们需要危机。”德阿纳以及别的与他志同道合的欧洲政治家们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另一种可能性——某个无法解决的、灾难性的危机可能引发欧元体系走向崩溃，甚至可能导致欧洲一体化的整体设想湮没。

如果光从1999年到2008年的经验来看，政治家们的观点似乎是对的。虽然在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政治联盟方面收效甚微，但是欧

元本身以及欧元区一般国家似乎真的赶上了繁荣的大环境。尽管从全球范围看，各种可能引发政治、经济形势动荡的事件时有发生，比如网络经济泡沫破灭、“9·11”恐怖袭击、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但是在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出现后的前些年，一直没有出现重大的危机。

然而，发生在2007-2009年的金融危机戏剧性地改变了整个情况。2009年1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和政治学教授巴里·埃森格林一语中的：“始于2007年的次贷危机，在2008年演变为全球信贷危机，并将在2009年导致欧元危机。”^①

对风险视而不见是金融危机出现前的那几年的典型特征，但是紧接着金融危机的爆发，风险规避行为像病毒一样在整个金融体系和银行系统蔓延，而且很快地，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就开始担心主权风险（即国家无力偿债的风险）。虽然美国和英国等国的预算赤字总额比欧元区许多国家还要大，但是市场从开始就把主要的关注焦点放在了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的成员国身上。

当然，这也就意味着，在财政预算方面的过激行为并不是引起人们关注欧元的未来的唯一因素——这是我们将在第2章中进行详尽探讨的主题。货币联盟本身是问题的焦点所在，现在这一点越来越成为广泛的市场共识。埃森格林关于“欧元危机”的论述是围绕着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与单一货币体制的可持续性而展开的。对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单一货币以及单一货币体制的生存造成威胁的，并不是投机性攻击或金融市场上的别的什么行为，甚至金融危机本身也与它们的生存危机没有太大的关系。不管欧洲的政治精英们怎样互相指责，也不管他们怎样诿过于人，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与生俱来的性质已经决定了它就是这样一个终将出现问题的事物。一次重大的危机是不可避免的。

正是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得以创建、据以发展的种种条约和协

^① 埃森格林，2009，第1页。

定以及政治协议，导致了联盟的诸多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由于政治精英们没有针对这一现实状况果断采取行动来确保联盟顺利运作，最终使得这些失衡成了欧元危机爆发的罪魁祸首。

本书第1章叙述欧元的诞生过程。我将回溯19世纪发生的一些事件，不过重点是回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岁月。在当时，货币联盟被当做达到某种目标的一种手段。主流的说法是，货币联盟将逐渐上升为一个政治联盟，整个欧洲大陆终将告别其漫长的战争和破坏的历史。从一开始，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体内”就被嵌入了许多异常的“构件”。要理解这一点，需要对其历史背景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从来不是一个最佳货币区。事实上，它简直离最佳货币区十万八千里。对此，我将在本书第2章中讨论。最佳货币区的很多条件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都不具备，其中之一是，它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政治联盟——这样的一个政治联盟必须包括透明的、能够自动运转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以及灵活的、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在本书第2章，我将用许多篇幅，就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的异常现象与源于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洞见进行对照分析。

本书第3章将描述和解剖欧元危机。欧元危机自2009年年底爆发以来，一直都在发展和深化。本章详细阐述了结构性缺陷导致危机发生的机制。欧元必将坠入深渊，这是意料之中之事，令人惊讶的反而是，危机在欧元诞生十年之后才真的发生。悖谬的是，欧元危机势头增大后，欧洲各国当局反而犹豫了，它们迷失在了各种最多只能在短期中起作用的一揽子援助计划当中，从来没有真正控制住局势的发展。研讨会开了无数个，首脑会议也举行了很多次，但是完全没有见到成效。正如《金融时报》在2011年春天的一篇评论中所说的，“在整个金融危机期间，欧洲各国的民选领导人们几乎没有错过任何一个令公众失望的机会”。^①

^① 《金融时报》，2011年3月26日。

欧洲各国政府和当局的干预都属于“太少了”、“太迟了”那一类，而且各国领导人似乎都在努力避免就各重大问题采取行动，这些重大问题包括，欧洲银行业的结构性缺陷，各成员国在程序上的相互矛盾，等等。

我认为，在下列两件事情中的某一件发生之前，欧元危机将会一直持续下去：

1. 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成为一个全面的政治联盟（因而也是一个财政联盟和转移支付的联盟），其劳动力市场流动更加方便、更富有弹性（因此也有财政和转移联盟）。

2. 整个联盟完全解体。

较小的国家，比如像希腊、葡萄牙和爱尔兰等国，发生的危机即便相当严重，也不怎么可能从根本上危及欧元。但如果经济规模较大、人口较多的国家，比如像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也都发生类似的危机，情况就将会完全不同。在本书第4章，我将指出，更可能发生的结果是强大的德国如果不能把欧元拉出困境的话，那它就会从这个泥潭中抽身而去。虽然在公开场合，德国官方支持欧元，但是普通德国民众对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的批评声音正在增加，甚至出现了许多直接的反对意见。维持货币的稳定，是德国根深蒂固的一个文化传统，它与欧元区及其中央银行的运作方式的冲突越来越趋于激烈。如果欧元的管理不能向与德国保持货币稳定的文化传统看齐，最终德国将会退出联盟，使欧元走向终结。这一点是我们今天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的。